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90后青年的 个人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

邹宇春 李建栋 王翰飞 崔晨洁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驰援武汉的271支医疗队里，90后是生力军。本文基于2020年2月份开展的湖北省居民疫情调查数据，对90后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和志愿参与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90后青年的个人心态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与其他的世代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90后青年整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也比较高，与90前世代存在显著差异，与00后世代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健康状况是影响个人心态和志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在回归模型的分析中发现个人心态对世代与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90后；青年群体；个人心态；志愿服务参与

[作者简介] 邹宇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建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王翰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崔晨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导言

早在20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就在《少年中国说》中宣告：“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青年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有怎样的青年就有怎样的未来，塑造能够担当历史大任的青年一代，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有重要意义。^[2]在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0后青年，逐渐走向时代的最前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的心态和行为处于何种状态对于了解和把握整个时代的脉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青年群体的行为特征和思想状况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青年群体有着属于该群体显著的心态和行为特征，外部因素与自身特点都可能影响青年群体对外在环境的认知，由此产生对社会独特的看法与行为。^[3]青年的心灵历程与社会大潮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同时青年的行为也伴随着社会运动跌宕起伏，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影响，并反作用于社会。^[4]90后青年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与其他代际相比，具有较强的集体行为能力，在某些负面因素和创伤性事件（生活境遇不佳、社会现状的不满、政府管控的逆反心理等）的影响下，有可能诱发群体性行为或社会运动。^[5]

2020年初开始迅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这突如其来的不可抗拒的灾难非常客观地还原了个人及所属群体最核心的本质。新冠病毒的流行既是对中华民族的考验，也是对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行为的考验。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为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灾害的同时,也为检验当前文献中有关90后青年行为和心态特点提供了一个较为少有的社会实验场所。本研究的出发点便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疫,90后青年群体的心态和行为会有哪些特点?此研究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对未来社会局势的预判和应对。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稳定时期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与行为特征

现有文献显示,90后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方面存在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特点。一方面当下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总体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伴有一定的无助感和焦虑感。^[6]除了生理的成熟外,青年群体存在生活经验欠缺、容易冲动,刚刚步入劳动力市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经济回报上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等问题。^[7]相比于80后、70后等群体,90后心态存在代际差异,其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价值观更多地受到多元观念的冲击,极力追求自由,淡化权威,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态度也更为消极和叛逆。^[8]其整体心态也呈现出一种个人利益至上、信任缺失,出现因“社会失范”和“价值真空”等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9]

社会参与方面,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中国青年的主体意识持续增强,政治上的自我表达需求更高。^[10]90后比80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对金钱的重视程度更低,利他行为的参与度更高。^[11]相较于非90后群体而言,90后的社会参与比例不断增高,参与领域也不断扩大,并且呈现出以认同与担当为特征的全方位主体参与,公益行为渐趋日常化。90后更加偏重于凸显个体人生价值和公共服务精神的领域,突出表现在诸如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社会志愿服务等公共社会服务领域方面,同时在参与动机上也更多地表现出主动性、自愿性、无偿性与共享性。^[12]而他们的个体特征、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其他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13]

(二) 社会风险时期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与行为特征

已有研究显示,疫情期间,人们普遍处于恐慌、焦虑、担忧等心理状态,而不同时期、不同代际的人群心态在影响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从恐慌的原因看,除了疫情本身的危险性外,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一些小道消息的传播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14]相较于非典,一些学者认为,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问题发生率有所降低,心态更好,可能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在此次疫情期间做了大量引导大众做好各项心理问题的防疫工作,居民了解疫情信息的途径增多。^[15]风险认知与行为差异存在于代与代之间,青年一代与父辈一代对于风险感知和反应存在极大差异。^[16]

社会参与方面,在重大突发性灾害发生后,青年的社会参与逐渐以志愿参与为主,高校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青年为主体的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奋战在灾区最需要的地方,用自己的力量为灾区、社会做贡献^[17],青年在民族灾难与国家发展面前始终敢于担当并更加乐观,从成功抗击2003年非典到共同走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阴霾,广大青年与祖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投身公益志愿服务事业,成为引领时代的风向标、社会文明的风景线。^[18]有学者特别指出,90后青年的志愿参与可以弥补疫情防控中的人力不足,可以作为储备力量和机动力量随时进入工作,且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志愿培训上手难度相对较低,可以尽快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优势。^[19]

此外,一些学者也致力于研究个人心态与志愿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积极心态的养成有助于激发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内在动力,有利于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20]也有研究发现,青年群体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价值观,但在线上和线下的社会参与度都较低。^[21]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稳定期间，研究青年群体方面的文章较多，涵盖青年群体的各个方面，而类似于疫情这种重大的社会风险时期，研究普通民众的共有行为特征和共有价值的较多，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关注90后这一特定青年群体的研究颇少。考虑到这些研究的不足，以及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行性和研究的代表性，本研究主要将问题聚焦于两个维度，即90后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结合文献回顾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其他群体相比，90后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更好。

假设2：与其他群体相比，90后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更高。

假设3：个人心态越好，则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越高。

有鉴于此，本文假设的分析研究框架主要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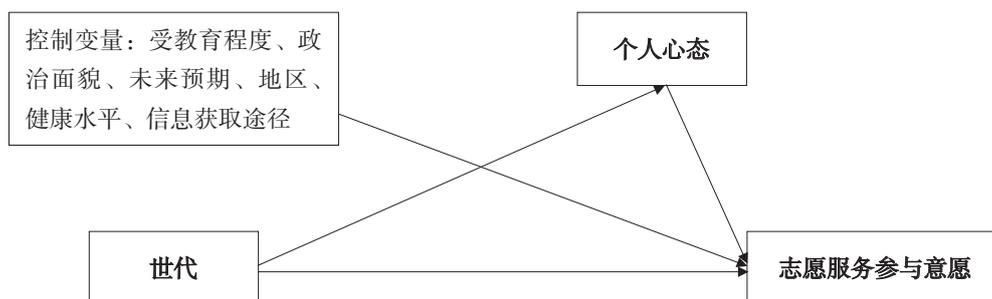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世代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与个人心态的中介效用研究

三、数据和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政策研究院三家科研机构共同组织实施的“新冠肺炎流行时期湖北地区居民公众意识调查”。该调查于2020年2月初对湖北省近3万个样本通过网络推送方式进行网上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000份，同时课题组还动员湖北省十所高校中260余名居住于湖北各地的大学生通过网络推送和电话调查方式对其所在县、乡、村的居民进行调查，共回收网络推送问卷4200份，电话调查问卷1248份。合计回收有效问卷12448份。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对数据做了后加权处理。此次调查内容涉及疫情期间民众的个人心态、社会评价、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以及未来预期等变量，能够满足验证本文研究假设的变量需求。

(二)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在问卷中，受访者回答：“在‘新型肺炎’防治活动中，如果下列活动需要志愿人员，您是否愿意参加？”包括：“为医护人员或患者服务、为社区居民面对面服务、通过互联网提供志愿服务、其他类型志愿服务”，选项包括“已参加”“没参加但愿意参加”“没参加且不愿意参加”以及“不知道”4个测量等级。在此分别将这4个层级赋值为：“已参加”4分，“愿意”3分，“不知道”2分，“不愿意”1分，通过累加，最小值为4分，最大值为16分。分数越高，表示参加志愿服务的意愿越高；反之，则越低。

2.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

本文的受访者按照出生年份，可划分为“70前”“70后”“80后”“90后”“00后”。为了聚

焦考察青年群体的行为和心态，分析考察代际之间的差异，本文将“70前”“70后”“80后”合并为“90世代之前”，与“90世代”“90世代以后”进行比较。其中90世代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

中介变量是青年群体的个人心态，在问卷中通过受访者回答“总的来说，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来测量受访者的个人心态。选项分为1-5个等级，其中1表示非常积极乐观，5表示非常消极悲观。为研究便利，将分值进行反向赋值，即5分表示非常积极乐观，1分表示非常消极悲观。

3.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显示，与其他代际群体相比，90后青年群体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所占的比例更高，因此将受教育水平（处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作为控制变量。政治面貌（处理为党员=0、非党员=1）也是影响志愿参与的重要变量，90后青年群体中党员比例要低于90前的其他代际群体。未来预期与当前社会状况紧密相关，对心态和行为都会产生影响。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觉得控制‘新型肺炎’疫情还需要多长时间？”来测量与疫情相关的未来预期。本文将小于等于“半年”记为“1”，表示“预期较好”；将大于“半年以上”或者“不清楚”记为“0”，表示“预期较差”。另外，调查时受访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武汉地区=1、非武汉地区=0）也会对个人心态与志愿参与意愿造成影响，因此将受访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也设置为控制变量。

此外，在个人心态的影响因素方面，信息获取途径的数量会造成社会个体出现心态差异，因此本文将信息获取途径的数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问卷中受访者回答“您现在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来了解以上信息？”来进行测量，总计有11个途径，每个途径通过“0（否）”和“1（是）”记录。本文中通过将11个途径进行累加，分值越高代表途径越多；反之，则越低。自身的健康状况很可能会是影响心态和行为志愿服务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也将自身的健康状况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通过问卷中受访者回答“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是怎样的？”来测量。选项有“很好”“比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说不清”。本文将“很好”和“比较好”赋值为3分，记为“好”；将“一般”和“说不清”赋值为2分，记为中等；将“较差”和“很差”赋值为1分，记为差。

在剔除变量缺失值后，文中涉及的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样本统计特征值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频数/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10424	1.51	0.50
男	49.56		
女	50.44		
受教育程度	10309	2.36	0.80
初中及以下	20.27		
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	24.02		
大专及以上	55.71		
政治面貌	10257	0.85	0.36

续表:

党员	15.22		
非党员	84.78		
70世代前	14.82		
70世代	19.69		
80世代	22.96		
90世代	31.26		
00世代	11.27		
个人心态得分		3.97	0.92
志愿服务意愿得分		10.80	2.07
信息获取途径数量		3.04	1.76
自身健康水平		2.83	0.44
未来预期		0.90	0.30
所在地区	10257	0.14	0.35
武汉	14.20		
非武汉	85.80		

四、不同世代下个人心态和志愿参与意愿的分析研究

(一) 描述性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 疫情期间整体的心态均值为3.97分, 不是很高, 处于一个中等偏乐观的程度。从各个代际群体来看, 个人心态的均值总体上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在80世代处出现峰值, 之后略有下降。这可能是由于80世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造成, 是比较乐观的一代。从本文的研究对象90世代来看, 其个人心态得分的均值为3.95分, 略高于70前世代, 但略低于其他几个世代。

另外, 随着代际的后移, 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在逐渐升高, 每个世代的志愿参与意愿都处于较高的水平, 其中90世代的均值为10.97分, 要高于70世代前和70世代, 但略低于80世代和00世代。

表2 不同世代下的个人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差异

		总体	70世代前	70世代	80世代	90世代	00世代
个人心态 (Range=1~5分)	均值	3.97	3.83	4.00	4.04	3.95	4.01
	标准差	0.92	0.92	0.91	0.90	0.91	0.95
志愿参与意愿 (Range=4~16分)	均值	10.80	9.87	10.86	11.05	10.97	11.06
	标准差	2.07	2.63	2.12	1.78	1.87	1.77

(二) 模型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OLS回归,对个人心态和志愿参与意愿进行分析研究,经过数据整理,主要结果如下。

表3 模型分析

变量	模型1 y=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模型2 y=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模型3 y=个人心态	模型4 y=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个人心态				0.24*** (0.03)
出生世代 (90世代为参照组)				
90世代前		-0.14* (0.07)	0.05* (0.03)	-0.15* (0.06)
90世代后		0.09 (0.10)	0.05 (0.04)	0.08 (0.10)
健康水平	0.77*** (0.07)	0.76*** (0.07)	0.31*** (0.03)	0.69*** (0.07)
信息获取途径数量	0.06*** (0.02)	0.06*** (0.02)	-0.00 (0.01)	0.06*** (0.02)
性别	-0.09* (0.06)	-0.09* (0.06)	-0.02 (0.03)	-0.08* (0.03)
政治面貌(党员=0)	-0.28** (0.08)	-0.29*** (0.08)	-0.12** (0.04)	-0.26** (0.08)
受教育程度	0.26*** (0.04)	0.24*** (0.04)	0.03* (0.02)	0.23*** (0.04)
未来预期	0.21* (0.10)	0.20* (0.08)	0.13* (0.04)	0.17* (0.10)
地区(非武汉=0)	-0.40*** (0.08)	-0.39*** (0.08)	-0.06* (0.04)	-0.37*** (0.08)
常量	8.34***	8.51***	3.14***	7.74***
R ²	0.06	0.06	0.03	0.08

注: p***<0.001, p**<0.01, p*<0.05, p+<0.1

第一,从模型1中可以看出在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中,每个控制变量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从标准化后的系数来看^①,健康水平对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大,对模型1贡献程度最高,信息获取途径、受教育程度和未来预期都和志愿参与意愿存在正相关,非党员比党员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更低。就地区来说,武汉地区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要低于非武汉地区。

第二,在模型2中加入世代变量之后,可以发现与90世代相比,90前世代的志愿参与意愿要相对较低,而与90世代之后的志愿参与意愿在回归中不存在显著差别,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第三,从模型3中可以看到个人心态的影响因素中,健康水平与个人心态存在着正相关,即健康水平越高,个人心态则越好。另外,人们对未来预期越好,其个人心态就越好。就政治面貌而言,党员的心态比非党员的心态要好,而地区和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变量只和个人心态存在非常微弱的相关关系;相比非武汉地区居民,武汉地区居民的个人心态要更消极一些。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心态越好。在世代变量下,90世代与00后世代在个人心态上不存

①为简化模型,标准化系数没有在表中呈现。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以下同。

在显著差别，但略微低于90前的世代，假设1也没有得到验证。需要提及的是，比较标准化后的各变量系数，可以发现健康变量的系数最高，说明它对个人心态的影响力最大。

第四，从模型4中可以看出，不同世代具有不同的个体心态，而个人心态越好则志愿服务参与意愿越高，从而验证了假设3。以90世代为参照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析个人心态对于世代的中介效应，发现模型4中的90世代前的回归系数相比于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显著并且变小，个人心态在世代与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用占比大约为7%。同样，比较各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发现，健康变量的系数最大，其对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大。

总的来说，通过对个人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出生世代作为一种天然属性并不是影响志愿参与意愿和个人心态最重要的因素，从标准化后的各变量的偏相关系数来看，健康水平或许才是研究疫情期间的群体行为特征的关键因素。

五、主要结论和反思

随着社会变迁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这场巨大社会变迁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却经历着与前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形成了与前人明显不同的行为、态度、现象和问题。^[22]本文主要针对90后青年群体在疫情期间的个人心态与志愿参与意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代际差别，并提出相应的假设予以检验。

分析结果表明，90后青年在疫情期间的个人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上都处于中上水平，不同代际在个人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而后天的自身的健康水平才是关键点。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度过疫情风险时期，一定要通过适当的办法和措施切实推动青年群体锻炼身体，提高青年群体的健康状况，从而提高青年群体的个体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另外本文一个意料之外的分析结果就是90世代之后的群体也已经崛起，不管是在个人心态方面还是志愿参与意愿方面都已基本超过90世代以及90前的各个世代，差异性逐渐缩小，已成为疫情期间一支“勇敢的逆行者”，逐渐担起了时代的重任，展现了新一代青年的群体责任、使命感和公益品格。^[23]就像李泽厚2006年在《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一文中，曾称赞年轻一代“看似平平淡淡，无适无莫，甚至声色犬马，嬉戏逍遥，却可随时挺身而出，坚忍顽强，不顾生死，乐于承担”^[24]。

在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北大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25]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群曾经在大众眼中还是“孩子”的90后、00后青年，书写了大爱与责任担当，表现得非常勇敢^[26]，仅在武汉地区参与抗疫行动的90后和00后青年占据近1/3的人数，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志愿参与撑起了疫情下的中国。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M]. 梁启超全集(第2卷).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11.
- [2] 周晓虹. 从青年入手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精神启示[J]. 中国青年研究,2018(3).
- [3] 李春玲. 青年群体特征及诱发社会风险因素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16(11).
- [4] 刘致学. 波动与平衡——社会不稳定性青年行为特征及其控制[J]. 青年研究,1990(9).
- [5] 王欣. 创伤叙事、见证和创伤文化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 [6] 李春玲.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J]. 社会学研究,2019 (3).
- [7] 邓志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现代性嬗变[J]. 中国青年研究,2018(4).
- [8] 姚亮,吕东霞. 解构与重构:青年对社会稳定的双重影响——近年来关于青年与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综述[J]. 中国青年研究,2017(8).
- [9] 胡洁. 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变迁、现状与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17(12).
- [10] 吴鲁平. 90年代中国青年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J]. 当代青年研究,1994(Z1).
- [11] 魏莉莉. 青年群体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基于90后与80后的比较[J]. 中国青年研究,2016(10).
- [12] 时昱,沈德赛. 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现状、问题与路径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18(5).
- [13] Sarah Dury,Liesbeth De Donder, Nico De Witte, Tine Buffel, Wolfgang Jacquet, Dominique Verté .To volunteer or not :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s, and social factors on the likelihood of volunteering by older adults[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 2015(6).
- [14] 李爱梅,凌文轻,曾红. 非典流行期间居民的心理及行为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2004(6).
- [15] 金岳龙,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社区居民疫情信息获得途径及其与心理行为问题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2020(6).
- [16] 吕鹏,刘芳. 疫情风险认知过程与代际互动模式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 [17] 南山. “5·12”大地震中青年群体行为分析[J]. 当代青年研究,2008(8).
- [18] 蒲清平,杨聪林. 改革开放40年青年思想的演变历程及思想教育的经验启示[J]. 中国青年研究,2018(4).
- [19] 董海军,杨静. 国家动员与分散参与:90后青年的抗疫实践——以青年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2020(5).
- [20] 陈佳薇,傅小林. 志愿服务对培育大学生积极心态的作用机制探析[J]. 教育评论,2014(12).
- [21] Charlotte Silke and Ciara Boylan, Bernadine Brady, Pat Dolan. Social values and civic behaviour among youth in Irel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ntexts[J]. Ir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0(1).
- [22] 风笑天. 社会变迁背景中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研究[J]. 中州学刊,2013(1).
- [23] 胡小武. 从“垮掉的一代”到“逆行英雄”:90后青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群体镜像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20(5).
- [24] 周晓虹.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 [25] 习近平. 习近平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16/c_1125719125.htm.
- [26] 谭建光,王小玲,苏敏. 青年“勇敢群体”及其特征:以中国青年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2020(4).

责任编辑:李露萍